上 篇

民族哲学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民族哲学研究概述

谈谈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项新课题。两年多来，我们在着手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时，碰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有没有意义？许多同志对这些问题都持肯定意见。但也有些同志抱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要不要开展这项研究工作，因此，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当然，要彻底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具体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但从一般意义上，即从方法论的角度，也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探讨，因为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它也涉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问题。

大家都知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哲学的这个定义不仅指明了哲学同具体科学的区别，也指明了它同世界观的关系。任何人都可能对世界的一般性问题、普遍性问题有一定的看法或观点，或者说具备某种世界观，但这并不等于人人都掌握了某种哲学。普通人所具有的世界观往往是自发的、朴素的、零散的，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哲学则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自觉、完整、系统、严密的观点，即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能够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民族起码应当具备如下基本条件：这个民族已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

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每一个民族，不论人数多少，发展程度高低，只要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在从事科学实验的活动中，肯定会产生对自然和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对这两方面的知识进行某种程度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这个民族的某种哲学思想。当然，各个民族哲学思想系统化的程度，因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只要对世界一般问题、一般规律有了一定的系统的认识，就不能否认某一民族哲学思想的存在。

大家都承认，古希腊哲学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世界一般问题朴素、自发的看法或观点，“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0 页）。没有谁因其原始和朴素而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存在，恰恰相反，大家都一致公认希腊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恩格斯还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同上书，第 468 页）。赫拉克利特关于火是世界的本原，它按一定规律燃烧和熄灭的那段论述，显然带有朴素和直观的性质，但列宁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95 页）。如果有人以现在关于哲学的科学定义为理由，来否定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存在，那大家是不会赞同的。对古希腊哲学不能如此苛求，对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这样苛求。

科学文化和理论思维比较发达的民族，可能产生了专门阐述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历史的哲学著作。但是，有许多民族特别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没有或很少有这种专门的哲学著作，能不能由此判断这些民族不可能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哲学思想呢？不能。我国汉族的古代历史上专门的哲学著作也不见得很

多，但其哲学思想却很丰富。张岱年同志说：“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载《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0 年第 1 期）。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许多哲学思想不见得都反映在哲学专著当中，这些思想也可以反映在政治、历史、文学等其他著作或文献当中。譬如，《论语》不是哲学专著，而是关于孔子言论的汇编，但我们并不因此否认它所包含的丰富哲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论，情况也是如此。

这种观点和看法，也适用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或文献。在这些文献和著作中，也不乏有关哲学思想的论述。就蒙古民族来说，在它近千年的历史中，虽然至今在国内所发现的专门哲学著作很少，但其哲学思想的存在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蒙古族的许多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中，都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有些思想还是相当深刻的。在《蒙古秘史》中，关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根源及当时蒙古草原发生许多事变的根源，就有统统归于天命的说法。这部著作中所反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在《蒙古源流》中，有关于世界本原的整段整段的议论，提出了把世界的本原归之于风坛、水坛、土坛的三坛论。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的著作中也有比较丰富的关于哲学思想的见解。至于蒙古地区广泛流传的喇嘛教中的哲学思想更其丰富。就是在民间谚语、歌谣和传说中，也包含不少朴素的哲学思想。例如，公元五、六世纪，在我国北方草原上流行着一首《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谣生命力极强，流传至今，听了之后仍然意味盎然，就如置身于苍茫辽阔的大地上，穹庐形的天恰似一座大蒙古包，笼盖在四方原野之上，这就是蒙古族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念——天圆地方说。又如，八百年前的蒙古族谚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身有首，衣有袖”，比喻汗（领袖）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要性。短短六个字，价值千金。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恐怕也是大同小异。比如，藏族的“因明学”，维吾尔族《福乐智慧》，彝族的《宇宙人文论》、《勒俄特衣》,苗族的《古歌》和《佳》，纳西族的《东巴经》以及明代回族哲学家李贽的大量哲学著作等，都是关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珍贵典籍，也是我国哲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财富。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一个民族的哲学是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这个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不可能设想，在我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各少数民族竟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否认少数民族存在哲学思想的看法，不仅贬低和抹杀了少数民族的重大贡献，否定了他们的文化，而且也是无异于对哲学的直接否定。就以实现祖国空前统一的元代为例，它是“疆域户数,远过汉唐”（《秋涧先生大全文章·便民三十五事》），被史籍誉为“汉唐之盛，所未有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的一代封建盛世。起过这样历史作用的朝代，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呢？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有的同志认为，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思想，也是从汉族那里接受过来的，实际上是汉族的思想。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2 页）元朝蒙古族统治阶级统治中国将近一个世纪，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我们没有理由认

为当时蒙古族统治阶级只是中国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更没有理由认为当时蒙古族统治阶级的思想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而是别的民族的思想。我们不否认各民族之间思想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少数民族的思想里有汉族思想的影响，同样，汉族的思想里也有少数民族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一旦接受了汉族思想的影响，就会把这种影响同自己民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变成自己思想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否则这种影响就不会继续下去。各民族间思想上积极的影响不仅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这是各民族相互交往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没有理由把这种相互影响只看做是单方面的。

在讨论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有无必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大力发掘、搜集、翻译、整理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遗产，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是胜利完成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任务的需要，也是真正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需要。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67 页）可见，理论思维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发展和继承这方面的遗产，是提高理论思维的必要途径。正像恩格斯指出的，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同上书，第 465 页）。这里所说的“学习

以往的哲学”，即包括学习和继承各民族历史上的哲学思想遗产。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与经济建设是互相促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会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提供物质保证。显然，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对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把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是小题大作，或者认为，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都是个问题，即使有哲学思想，那也是遥远的历史，与现实挂不起钩来，对学习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会有什么作用。其实这是一种糊涂思想，也是一种历史的偏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以以往各个时代的思想材料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都是在以往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这样，才能构成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在这一门历史科学中，以往的思想，虽然不排除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财富，但主要是本民族的，本国家的。这正是构成各民族的思想具有自己的特征、具有自己独立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缘由。同样，每一个民族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情况和特点有机结合，才能在对比和联系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而在本民族思想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思想的特点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第三，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各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首先开发和统一了祖国的边疆，有的统一过半个中国，甚至像蒙古族和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还实现了全国的空前大统一。我国少数民族对发展祖国的经济、科学文化和军事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所共知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既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我国各少数民族，怎么可能没有哲学思想方面的概括和总结呢？因此，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遗产，同研究他们对祖国所做出的贡献一样，是十分必要的，是有重大意义的。

第四，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也可以看出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公开发行的几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只是汉族的哲学史，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这是不符合中国哲学史的本来面貌的。就是汉族哲学史著作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奴隶社会和近代哲学这两部分所占的分量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我们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代部分材料不足，而对近代部分则重视和研究得不够。古代部分之所以材料不足，同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以及重视程度不能不说有密切关系。为了充实这一薄弱环节，除继续发掘汉族哲学思想遗产之外，大力发掘、搜集、翻译和整理少数民族哲学思想遗产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能够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就能为弥补上述的欠缺做出贡献。再者，我国少数民族本来就给我们遗留下了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遗产采取冷漠的态度。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我

国一些少数民族直到解放还保留有原始公社制残余，西藏地区直到 1951 年和平解放，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直到 1956 年民主改革前夕，还完全处于奴隶制社会形态；从宗教信仰方面来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有原始宗教活动，另一些少数民族则信仰互不相同的人为宗教；从家庭和婚姻制度方面来看，我国一些偏僻、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初还保留有某些原始的婚姻家庭遗俗。所有这些情况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给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思想提供了天然的“百科全书”,这部天然的‘百科全书’对于我们研究阶级的起源和本质、宗教的起源和本质以及阶级和宗教的关系；对于研究哲学的产生和本质以及哲学同宗教的关系、哲学同阶级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十分珍贵的。对于这些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无疑是对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补充和发展，使其在体系和结构上更加完整和系统，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和丰富。由此可见，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是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充实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提高它的质量的必要条件和步骤。

最后，从国际学术动态来看，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也是十分必要的。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在对我国少数民族积极开展研究。以蒙古学为例，目前在欧、亚、美等地区，有四十多个国家设有蒙古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从 1959 年 9 月至今，已经开过三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1970 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决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其中许多国家的学者在研究蒙古族哲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又如，对维吾尔族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杰出的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哲学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著作《福乐智慧》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同样，对藏、彝、傣、苗等

少数民族思想的研究，在国际上也很重视。与此相比，我们国内却很少研究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从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着想，我们也有必要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样做也有助于我们同各种错误观点和反动宣传做斗争，维护祖国的尊严。

在全国各民族院校和有关研究机构的重视和支持下，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同志已投入到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工作中来。我们坚信，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定会带来丰硕的成果。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2 年第 1 期）

独具特色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

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哲学史对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得很不够，它不能反映我国各民族哲学史现状。

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我国北方民族必将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为填补中国哲学史的这一空白做出应有的贡献。

那么，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到底有哪些特色呢？现根据已经取得的早季收获，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的特点做简要分析。

1. 文史哲不分家

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他们世代过着“ 韦耩毳幕，以御风雨， 膻肉酪浆，以充饥渴 ”的游牧生活。交通闭塞，生产落后，加之游牧经济所特有的游动性和脆弱性，使这些民族长期处于落后状况。民族的形成比汉族晚，使用文字的历史比较短，很难找到直接记载他们早期哲学思想的历史文献，只有在神话传说、哲理诗、谚语、格言以及后人撰修的史书中去发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的早期哲学思想。以蒙古族为例， 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后，蒙古族才形成；成吉思汗建国后开始使用畏兀儿（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到 14 世纪初（1307 年）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儿创制了蒙古文字，至此，蒙古族才有了直接记载的文献史料。在此之前，至少在使用畏兀儿字母以前，蒙古历史是没有直接文字记载的。蒙古族最早的史书《蒙古秘史》，最初是用畏兀儿字母拼写的蒙语书。现存本则是明初洪武年间以“纽切其字，谐其声音”的方法用汉字进行译音，并附有字译和意译的《元朝秘史》本。这部巨著，世称蒙古族三大史书和三大文学名著之一。近年来，随着蒙古族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部历史名著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发掘蒙古族早期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蒙古秘史》虽然不是哲学专著，但却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内容包括，把草原所发生的一切变革和吉凶福祸统统归之于天命的思想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不仅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和强烈的游牧民族特色，而且，与同一发展阶段的汉族哲学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样，《蒙古源流》、《古蒙古汗统大黄史》以及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藏族的《西藏王统记》、《红史》、《知识总汇》等历史名著，都有相同的情形。历史学家从中发掘历史素材，文学家从中搜寻优美的文学题材，哲学家则从中探索深邃的哲理。这正如同我们把汉族早期思想家孔子、庄子等人的著作，既当做文学作品又当做哲学著作是一样的。

这种共同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首先，北方民族与汉族在历史上有过近似的社会环境，经历过基本相同的社会发展过程，反映同一过程的思想，必有大致相同之处。其次，这种现象是北方民族与汉族之间不断地交流和相互融合的产物。

2. 一种朴素的表现形式——哲理诗

比较哲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大都遵循

着共同的规律。在古代，人类虽然处在思维发展极其简单的阶段，但却喜欢探索一些重大的问题，诸如天地缘何而始，宇宙万物和人类从何而来等，对这些问题的猜测和回答，属于古代哲学范畴。所以，人类早期哲学思想都是以朴素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往往寓哲理于具体形象之中，采取神话传说、哲理诗、谚语、格言等形式，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这些抽象的哲学问题。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也毫无例外，他们不仅提了这些问题，而且也按照自己独具特色的形式天才地回答着这些问题。为我国古代哲学园地增添了北方民族智慧的结晶。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习为歌唱”，塞北草原历来以“歌海”、“诗乡”著称于世。他们善于运用优美活泼的形式，朴素的语言、简练的文字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回答上述哲学问题，从而使这些“缘事而发”的诗篇表现出一定的哲理性。这些作品，一部分，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保留在民间，如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英雄史诗《吾古孜纳玛》、克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之歌》等；一部分，镶珠嵌玉般地集纳熔铸在各种古代典籍中；一部分，则是专人专著，如藏族萨班·贡噶坚赞的《萨迦格言》、索南扎巴的《格登格言》、孔唐·丹白准美的《水树格言》、维吾尔族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和艾合迈德·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等。这些珍品，是北方民族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容易记忆和流传，语意警策，偏重于劝诫和训喻，包含着深切的人生体验和哲理。公元 10 世纪初，在维吾尔族中流行有这样的诗句：“无边无际的宇宙不停运动，我们在其间不过一滴一点。”罗马的卢克莱修的诗句“一个人不论站在任何地方，在他周围，总会有那无限的宇宙，向各方伸展”，以及中国汉族关于“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思想与之相比，不仅十分相近，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它还把无限宇宙同永恒的物质运动联系起来了。

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维吾尔族有“四素”和“四性”说，蒙古族有“阴阳五行”说，藏族也有“四素”说。虽然，从这些思想中能看到印度“四大种子”论（风、火、水，地）和中国汉族“五行”说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民族所处的独特的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在用基本相同的观点回答同一个问题时，也不失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比如，11 世纪维吾尔思想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长诗《福乐智慧》中，把正义、幸福、知识、美德喻为良友，并将其同构成宇宙的四元素相比拟，说：“这四个是我良友如四种元素，四元素相合才有真正的命数。”公元 9—10 世纪的另一位维吾尔族思想家法拉比在论述物质的实体性时指出，土、水、火、气四元素是首要的和基本的物质存在，干、热、湿、冷是四元素的基本属性，并形象地把“四素”及其“四性”比喻为四行诗组成宇宙“柔巴依”（Rubi 一词源于波斯诗歌的一种格律，每首四行，押 aaba 韵），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四素”和“四性”构成的。法拉比在《科学纲领》一书中说：“我们如分类来描述，它们就像柔巴依诗体，由火、气、水、土组成；其性质也分为四种：热、冷、干、湿。”这些观点虽非独创，表现形式却很有特色，在这些形象的比喻和精辟的论述中，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气息，富于维吾尔族特色。

偏重于劝诫和训喻的哲理诗，是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人民行为的规范。古代哲学寓于哲理诗之中，而哲理诗又以其刚健清新的语言和淳朴自然的形式，把充满人生体验的深刻哲理展现给人们，成为人民行为的规范。蒙古草原上流行有这样的诗句：“广阔宇宙万物纷纭，遵循变化规律”；“天上的风呵变幻无常，人生在世岂能永生？”维吾尔族中也有许多用哲理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在长诗《福乐智慧》中，这种辩证法思想更为丰富。诗人用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的优美诗句，提出并分析了善恶、福祸、生

死、乐苦、好坏、美丑以及有知与无知、节俭与奢侈、正确与错误、贪婪与满足等众多的矛盾，通过分析这些矛盾的相互关系和转化，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的世界图像。更为可贵的是，书中还提出了反映这些矛盾运动的哲学概念“无常”：“幸福无常如流水，宇宙在转动永不停止”，“无常对我来说不算缺点，我喜欢的是更新”。

3. 北方少数民族哲学与宗教关系密切

宗教对北方少数民族哲学的影响，除原始宗教之外，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较大；特别是佛教不仅在北方地区广为流传，而且长期在蒙古族、藏族地区居统治地位。佛教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影响深远。由于文化落后，在蒙古族、藏族地区往往喇嘛就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或者一些有为青年要想深造成才，就得弃俗“赴藏求学”。清代蒙古族学者罗卜桑却丹就是个典型。罗卜桑却丹自学精通了蒙古文之后，在他 24 岁时，为了逃避现实生活，“放弃了当俗人的念头”，踏上了赴藏当喇嘛的征途。途经北京时，因盘缠用尽，无奈进了雍和宫，当喇嘛攻读经文。由于他的刻苦，4 年掌握了汉、满、藏文，29 岁时被清廷授予“四种语言固师”之称号，著有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蒙古风俗鉴》。在藏族中，淹贯三藏、学富五明的一代宗师贡噶坚赞是萨迦派（佛教的一个派别）的第四代寺主，他著有《萨迦格言》等 19 种著作，被尊称为萨迦班钦（大学者）。为元朝创制蒙古新字的八思巴是萨迦新派的首领，还有《水树格言》的作者孔唐·丹白准美，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知识总汇》的作者工珠·元丹嘉措等，他们既是学者，又是大喇嘛，同时也是政界人物。因此，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佛教意识对哲学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古蒙古汗统大黄史》在回答天地缘何而始，宇宙万物从何而来的问题时，就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书中开篇第一章就把宇宙的本原归之为“虚空”：“初金色世界已成，予青色虚空中”

这个“虚空”就是佛教所说的“空”，黄帽派喇嘛教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合”（种种条件）所构成的假象，事物本身并无实体性，而只不过是个“生时无所来”而又“无自性”的东西，即“空”。书中对宇宙的描绘，也基本上采用了佛教的模式，认为：虚空中“十方风起，相互撞击”而成金粉似的尘埃，尘埃进而成浮油状的东西，至此，宇宙便形成了。在《蒙古源流》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书中开篇第一卷就提出了著名的“三坛”论（风坛、水坛、土坛），并解释说：这三坛不是原初就有的，也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在“虚空”中先后产生的。书中说，风坛，是“由虚空之十方，狂风大作，往来相冲”而成；水坛“则由先时之风，冲击生成大云”“由是雨水永注，形成无边之大海”而成；土坛，是由“水上生微尘，凝如乳上之脂”而慢慢演变而成的。土坛中有众山之王须弥山，七金山、七大海、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等等。显然，对宇宙模式的设想及描写这一模式的语言都是从佛教中搬来的。藏族哲学在这方面也深受佛教影响，《西藏王统记》开篇第一句就是“最先，此外器世间，其体虚空。”也把“虚空”作为宇宙的本原，并且也按照佛教模式描绘了宇宙的形成和结构：由虚空中“十方风起，互相鼓荡”形成了“其色青灰，其质坚硬”的风轮，“风轮之上，有水积聚，成为大海”“大海之上有黄金构成之大地”，大地中央是“各种宝物构成之山王须弥山”“四面有七金山围绕”“诸山中间，有七戏海”等等，这些描绘同小乘佛教经典《俱舍论》中所描绘的关于宇宙的模式几乎完全一样，对于这一点，《西藏王统记》的作者福幢也是承认的，他说：以上“皆明载俱舍论中”。足见佛教对蒙、藏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哲学中，伊斯兰教义哲学的影响也很大。回族《十二等复生》中提出“主造天地万物生”的思想。书中说：“天地日月主造化，风云雷雨主造生”，

“灵魂复来人生起,犹如枯树又逢生”这种宗教唯心主义的宇宙观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宇宙的本原问题上，而且还表现在一系列其他哲学问题上。比如，在论述民族的起源时，10世纪维吾尔族思想家马哈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就宣扬了神创论的思想。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他们的祖先“是安拉所器重的诺亚圣人之孙，雅排司之子突厥。正如东罗马人是安拉所器重的易卜拉音圣人的重孙、依思哈克之孙、伊索之子罗姆的后裔一样。”在蒙、藏哲学中也有类似神创论的观点，不过这个神已不是安拉，而是观世音菩萨了。《西藏王统记》第二章在论述“西藏人种之由来”时说，藏族人是由观世音菩萨命一位尊神变为猕猴，这个猕猴与岩罗刹女结合而生出来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所谓“西藏是观音化度之国土”这一佛教思想在哲学上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剥开其神秘主义的外衣，书中关于猕猴变人及其演变过程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它较之“女娲氏抟黄土为人”的神话前进了一步，具有一定的朴素的科学猜测性质。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更加复杂。在北方少数民族哲学中，哪些是属于民族的哲学，哪些是属于宗教信仰，在民族哲学中哪些是属于受宗教影响的部分，哪些又是属于被哲学吸收和融合的部分以及二者关系的历史发展等，都需要我们反复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哲学，不能忽视宗教的影响。

4. 北方少数民族哲学与汉族哲学相互渗透和融合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通过互市、和亲以及相互吞并和掠夺战争等方式与中原汉族王朝保持着十分密切和复杂的关系。互市、和亲以及战争等历史事件具有积极与消极两种因素，仅从这些历史事件所产生的积极方面的客观效果来看，伴随而来的是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